

科学态度和革命文风

(根据胡乔木同志讲话记录
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一九七八年六月

革命的文风是马列主义科学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列主义科学态度从根本上说与一般的科学态度相同，可是也有一些不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研究的对象、采取的方法方面是有不同的。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科学态度，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科学态度，一般说没有阶级立场的问题，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在同宗教、迷信、同历史上的偏见作斗争的时候，虽然也有战斗性，但是，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著作不存在革命文风的问题。

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根本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科学态度是阶级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是革命信念、革命意志和求实精神的统一，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马列主义是讲阶级斗争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讲阶级斗争的，当然有阶级性，有党性。可是，它是科学的，它一定要有客观性。如果离开了客观性，就不成为科学。这里说的客观性，不是旁观中立的态度，而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必须立足于客观的科学分析基础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根据这种科学产生一种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念，产生一种革命的意志。这种革命信念、革命意志不可缺少。但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还要从实际出发，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离开了求实精神，这种革命信念、革命意志就有变成主观主义的信念、意志的危险。求实精神不是屈服于现实，同现

实妥协。如果那样，就会变成机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研究人类历史、研究当代的阶级斗争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应用到实际里面去的时候，必须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不能停止在理论范围里，否则就要变成空谈。它必须是行动的指南，必须受到实践的检验，并且不断用新的原理来补充自己，来取代某些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得不再适用了的旧的个别原理。这就是阶级性和客观性的统一，革命信念、革命意志和求实精神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些统一的两个方面，缺一个方面都不行。缺少一个就不成为科学态度。

科学态度既不是只承认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不承认革命的基本原则那种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又不是宗教、迷信，不提倡盲从，不要求人们作驯服工具。科学态度要求对客观真实的忠实。忠实于实际，而不是忠实于个人的愿望、忠实于个别原理、忠实于个人。所以毛主席讲：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在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哲学家提出过，为着发现真理就要破除一些迷信。如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讲破除四种幻象：种族的幻象、洞穴的幻象、市场的幻象、剧场的幻象。幻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所谓“种族的幻象”，就是把人当成一个种族。以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一切都为人而存在。人是最神圣的，是一切的标准。如果抱着这种态度，就不能发现科学真理。这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不能对人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人看得过

于高超，以为人要作什么就可以作什么，一切都是围绕着人而存在的。这就不可能有一种客观的态度。所谓“洞穴的幻象”，是指某些学者某些个人在他的洞穴里，发现真理受他所处的环境的局限，以致不能看到在广大世界范围的真理。所谓“市场的幻象”，是指人与人之间要交际，如商品在市场上一样。市场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交际要通过语言，但语言常常不能准确地表达客观事物，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所谓“剧场的幻象”，是指各种各样的学说，就象在剧场上演戏一样，一幕幕的变换。我们不要受舞台人物、场景、情节多变的影响。培根所讲的打破这四种幻象，在近代科学发展历史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话当然没有毛主席说的那样清楚、彻底，但是可以看到，我们想要达到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必须排除多种障碍。这种障碍会以各种形式存在在我们的认识道路上。如果不排除，我们就会受各种偏见的束缚、影响，使我们不能认识客观真理。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对客观事物抱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

科学态度还要求对客观事物作一种全面的历史的探讨，要求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种探讨必须是准确的，有一定的分寸。在这方面，马克思、列宁、毛主席说过很多，这里不详细引用了。研究客观事物如果仅仅把事物观察了，并且作了记录，这还没有达到科学的要求。一定要发现客观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发现事物的本质。这个规律如果是客观的，它就应当是这个人证明了的，另一个人也可以重复证明。自然科学的实验，如果仅仅某个人能作出某种结果，换了另一个人却不能作出同样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就不能成立，就不能证明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相比，在这方面受的限制要多一些。因为社会现象的变化要比自然现象复杂，而且难以控制。自然现象的变化也很多，

但是可以设计一种条件，让它在实验室里进行观察。社会科学不可能作这种实验。虽然如此，只要是社会科学，只要是社会科学所发现的客观规律，它在基本上就应当对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认识的，可以观察出来的。这些规律因为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可以发生一些次要的变形，但是它们在本质上还是能够保持正确的，还是可以使所有的人在观察的时候得到同样结果的。当然，所有的人都可以观察到的这种事实，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愿意承认。这也是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相比困难要多的地方。即使如此，只要是社会科学的真理，不论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它都是客观存在。这里有一个对待科学是不是诚实的问题。如果有一种诚实的态度，就可以接受这种真理。自然科学的原理也会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在有些人受宗教或其他偏见影响的情况下就是如此。但一般说来，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在排除偏见影响的情况下，大多数的问题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在科学经过多年斗争已经得到巨大的胜利，人们的偏见已经逐渐缩小的情况下。

认识社会科学的真理是不容易的。要作大量的研究工作，要进行复杂的艰苦的劳动。它要求从事这种研究的人有对科学所必需具有的勇气，要敢于同各种反科学的偏见作斗争。所以，马克思在早期的文章中说，对于科学，对于真理，没有什么谦逊不谦逊的问题。他说，如果说谦逊，“精神的普遍谦逊就是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这个话同刚才所引毛主席的话是一个意思。毛主席把科学和迷信对立起来，也就是讲，科学不存在谦逊不谦逊的问题。所以，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同毛主席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认为，这就得从个别达到一

般，研究许多个别，然后经过科学的抽象，达到一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就要先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个别事物、个别问题，从中达到一般。所以马克思不愿意在一开始就把他所已经达到的一般结论拿出来。

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的这个观点曾经在别的地方再三地重复过，就是说，我们绝不可能完全的达到对于真理的认识，只能不断地接近它。列宁的这个观点在毛主席的《实践论》中曾经作了很透彻、很详细的说明。列宁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多次讲过反对共产党人的夸大狂，反对妄自尊大。不能因为自己是共产党人，是领导人，是高级干部，有权力，因此就可以不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工作中的问题。如果认为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改变一切，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是很可笑的。那就使得伟大变成为可笑。列宁说：“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是印证了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也讲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不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消灭的。党的领导机关、国家的领导机关只能使自己的工作符合于这种规律。社会主义的制度使得领导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与现实混为一谈。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计划，虽然要求它符合于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并不一定能符合。这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有的时候还会有很大的距离。

毛主席说：“任何英雄豪杰，他们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们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还说：“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前面引的这些革命导师的论述，都告诉我们，要坚持科学态度、按照科学态度进行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从事实际斗争的党要求自己的工作都正确是很困难的，只能作到大部分正确或基本正确。所以毛主席认为，任何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都必须一分为二。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以分析的，那就是形而上学。但是，我们要求错误犯得少一些，小一些，改正得早一些。所以，一个党为了要使自己的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一定要有正确的工作方

法和工作作风，并且要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作为自己制订政策制订计划的依据。

以上是就一般的工作来说的，不是说的写文章。我们不能要求每一篇文章都发现科学真理，都是一篇科学著作。但是，总得要求写文章要有同样的科学态度。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过，人们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是困难的。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包括杂文在内，要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也就是说，要求努力做到符合于科学态度。

有了科学态度，我们才谈得到革命的文风。如果没有科学态度，就谈不到革命的文风。科学态度是革命文风的基础。什么样的文章是有科学态度的文章；什么样的文章相反，是反科学的文章。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采取一种分析的方法，拿出一些文章来进行抽象，提出一些标准。但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而且，如果作了，是否就能对同志们学习写作有帮助，还是一个疑问。我想今天就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一些文章的片断，和一些反科学的文章来作个对照。通过这个对照，可以很容易认识什么样的文章有科学态度，有革命文风，而另外一些文章就没有科学态度，因此谈不到什么革命文风。

现在我就来念一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文章的一些片断。

第一个例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是评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这个话，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刘少奇就大肆宣扬“劳动创造世界”这个口号。“劳动创造世界”是“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同义语。这个话如果不认真进行分析，好象也没有什么错。马克思认真作了分析，指出：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就是说，自然界也是源泉。劳动如果没有客观的世界，这个劳动本身就不能存在。针对刘少奇宣扬“劳动创造世界”这个口号，毛主席说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劳动怎么能创造世界呢？是世界创造劳动，没有世界就没有劳动。没有世界就没有人，没有人还能有劳动？劳动创造世界，这是把头倒立了，劳动变成上帝，有点象上帝创造世界了。劳动能不能创造太阳，创造地球呢？很明显，虽然人在地球上劳动，但是，地球并不是人创造出来的。相反，人是在地球上生长起来的。所以，马克思说：“**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刚才说培根讲的“种族的幻象”，就是把人当成世界的中心，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劳动创造世界的说法同这种幻象差不多。正是因为一般人常常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所以这种违反科学的话可以长期流行，而习以为常，好象这就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主张用批判态度来审查各种材料。《哥达纲领》也是一种材料。一审查就不能不引出对这样一种非常错误的可是长期流行的说法进行分析批评。

第二个例子。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中写了一个序言。后来在1883年对这个序言加了一个小注。这个序言里原来有这样的话：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即产生于德国”。以后恩格斯对这个说法加了一个注说，“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初初看起来，“产生于德国”和“产生于德国人中间”，好象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这两者的含义是有原则区别的。如果说产生于德国，好象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与德国这个国家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事实上，它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是国际的产物。因为德国人同时接受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从民主革命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恩格斯这样一改，就把这句话的含义改变了。我们看后来列宁写《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就是把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发展了。怎么样在写文章的时候准确地表达客观事物，从恩格斯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字，因为原来表达不准确，而这种表达包含重要的原则意义，所以必须进行修改。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抱着一种多么严谨的科学态度！无论对别人的著作或对自己的著作，都不是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都要认真进行批判的审查。

第三个例子。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一章中讲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为了使这个问题尽可能有一种科学上的严格性和准确性，列宁特别说明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他说：“我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

意义。不，是按最狭义来说的，也就是，把国际意义理解为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的国际意义不仅限于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是包括所有的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那当然是极大的错误。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这段话是有特别深切的感受的。大家知道，确实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究竟应该怎么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以致使中国革命遇到极大的挫折，几乎陷于失败。

第四个例子。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对无政府主义者攻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反驳。无政府主义者诬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是“填胃的理论”。斯大林加以驳斥说：

“请诸位先生告诉我们吧：究竟何时、何地、在哪个国家，有哪个马克思说过‘吃饭决定思想体系’呢？为什么你们没有从马克思著作中引出一句话或一个字来证实你们的这种责难呢？难道经济生活和吃饭是同一种东西吗？要是有一个贵族女学生把这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那还情有可原，但是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摧毁者’和‘科学的复活者’，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地重复着贵族女学生的错误呢？而且吃饭又怎能决定社会思想体系呢？请考虑一下你们自己所说的话吧：吃饭和吃饭的形式是不变的，人们吃饭、咀嚼和消化食物古今都是一样的，而思想体系始终在变化和发展。例如古代的思想体系、封建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思想体系的几种形式。一般说来，难道不变的东西能决定经常变化的东西吗？经济生活决定着思想体系，马

克思确实这样说过，而这是容易了解的，但是，难道吃饭和经济生活是同一种的东西吗？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糊涂观念加在马克思头上呢？”

这段话同前面引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的话有相象的地方，都是对于一种错误观点进行的驳斥。在驳斥的时候，把对方说得含糊不清的话拿来进行分析，就揭露了他们的错误。

第五个例子。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第一节中讲如何研究战争。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

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下面还逐点批判了那种只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等错误观点。毛主席在这里，也是把问题提到十分确切的地位，一层一层地展开分析，从正面到反面来反复论证，使问题得到透彻的解决。这是我们都熟悉的。

从以上随手挑出来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他们所要论述的问题的。无论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是批判别人的观点，都是采取怎样严谨的科学的态度。他们总是经过严密的分析、严格的推理来展开他们的思想。我们要学习这种科学态度和革命文风。我们说话、写文章、处理问题，都要注意准确、有分寸。要不然就会把真理变成谬误，使伟大变成可笑。

现在来看看跟科学态度相反的一些文章是怎么写的。下面是一些反面的例子。

我们现在常常谈到党八股、帮八股。但是，大家恐怕很难看到

原来那种老八股文。真的拿出一篇八股文来，大家也不容易看懂了。八股文不仅要求文章的格式是固定的，并且要求文章里面的词句一定是要有来源的，又要切题，又不能用题目上的字，用的材料又要都是经书上的一些话。如果对经书不熟悉，就不知道它说的究竟是些什么。清人梁章钜写过一本《制义丛话》，引了一段拿八股文来开玩笑写的八股文。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八股文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八股文要讲对股、成对的。那段对股文字是这样的：“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乎，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这是一股。下面一股要跟这一股完全对起来。那一股是：“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黼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吾心”、“中怀”、“在抱”，说来说去都是说的“我的心”。“久矣乎”、“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都是说的时间很久了。讲来讲去，每一句话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都是一些概念的重复。什么道理也讲不出来，什么问题也不解决。这里举的例子虽然是讲的笑话，但八股文就是这样一种内容空洞的东西。它要有一定的格式，还要有很多讲究。但是，这种文章无论写得怎样好，反正是说了等于不说。无非从“四书”上面找这句话搭上那句话，那句话搭上这句话，转来转去，就凑成一篇文章。“四人帮”和他们的御用工具的一些文章，就其文章的千篇一律和空洞无物来说，可以说是八股文。但是，严格说来，“四人帮”的帮八股并不仅仅是空洞。如果象老八股文那样是纯粹的空洞，什么问题也不解决，那倒还好一些。那些帮八股还是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要求解决了他们要解决的问题的，所以比老八股文还坏。

关于诡辩，我建议大家看一看鲁迅《华盖集》里题目叫《论辩

的魂灵》的文章。这篇文章都是引别人的话。这些话并不是真有人那么说，是鲁迅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把那些诡辩方法集中起来写出的。如果不是这样集中起来，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明显地感觉到，对诡辩的认识不会那么清楚。这篇文章说：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谎也。卖国贼是说谎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本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现在妄称志士，诸君且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么？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诡辩派是古时候希腊哲学里的一个流派，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在欧洲流行，产生过影响。现在，象我刚才引用的这种诡辩，我们一看就觉得是毫无道理的。通过对这种诡辩手法的认识，我们再看一看“四人帮”写的东西，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运用这种诡辩手法的。

比方说，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国营企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所有的。他怎样来论证这一点呢？可以找出一段来看看：

“……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我现在不来详细地分析这段话，它的推理的每一步都是利用了诡辩的方法。同志们可以研究一下他是怎样通过一系列错误的推理

得到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结论的。这段谬论在过去好几年里曾经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大家可以当作一个练习，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剖析这段谬论。

另一篇文章是程越批判《论总纲》的，题目叫《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文章说《论总纲》提出三项指示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就是对抗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关于这个“三项指示为纲”的问题，华主席、叶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报告里，已经详细地讲清楚了。现在就是要看看程越怎么论证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绝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